



中国学术档案大系

主编 陈文新



宋元话本学术档案

刘相雨 主编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

中国学术档案大系

主编 陈文新

宋元话本学术档案

刘相雨 主编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元话本学术档案/刘相雨主编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4. 12
(中国学术档案大系)

ISBN 978-7-307-13458-4

I. 宋… II. 刘… III. 话本小说—古典小说评论—中国—宋元时期
IV. I207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19088 号

责任编辑:陈 帆 责任校对:鄢春梅 版式设计:马 佳

出版发行: **武汉大学出版社**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whu.edu.cn)

印刷: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 × 1000 1/16 印张: 29 字数: 432 千字 插页: 1

版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3458-4 定价: 7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二十世纪以来宋元话本研究巡礼(代序)

刘相雨

宋元话本的研究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从其学术发展历程来看,争论和质疑一直伴随着它的发展。在这一过程中,中国大陆学者和港澳台地区学者以及日本、韩国、美国等国外汉学家互相合作,相互辩难,共同促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的深入,许多有争议的问题逐渐有了大体一致的认识和理解。纵观 20 世纪以来宋元话本的研究,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

一、宋元话本研究的奠基期(1900—1949)

这一时期宋元话本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特征:一是新材料的不断发现;二是对学科基础问题的热情探讨。

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,首先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基本的研究资料。20 世纪初宋元话本的研究,首先面临的是研究资料匮乏的问题。由于宋元话本是以口耳相传的“说话”伎艺为基础的,现在流传下来的相关的书面文献资料非常少。虽然我们从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、灌园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、西湖老人的《繁胜录》、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以及周密的《武林旧事记》等记载中,可以知道宋代的“说话”艺术是十分繁荣的,但是“说话”的具体情形如何,“说话人”有没有可供参考的底本?如果有底本,底本的情形如何,等等问题,仍然不太清楚,加之上述记载之间互有齟齬,学者们对材料的解读又是见仁见智,因而宋元话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布满了荆棘。另外,我们今天见到的文献资料,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宋元“说话”的真实情况,学者们的看法也很不一致。

20 世纪初的学者能够见到的宋元话本作品，一开始只有乾嘉年间藏书家黄丕烈收录在《士礼居丛书》中的《宣和遗事》和《梁公九谏》等少数作品。这一时期新材料的发现和刊刻情况如下：

1911 年，董康把曹元忠 1901 年游杭州时得到的《五代史平话》影印出版，曹元忠在《五代史平话·跋》中认为“疑此平话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，而书贾刻之”。^①

1915 年，缪荃孙（江东老蟾）刻印《京本通俗小说》（烟画东堂小品本），他在该书的《跋》中认为这些作品“的是影元人写本”，共收入《碾玉观音》《菩萨蛮》《西山一窟鬼》《志诚张主管》《拗相公》《错斩崔宁》《冯玉梅团圆》七篇作品。^②

1916 年、1917 年，罗振玉先后影印了原藏于日本的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的小字本和大字本，收入《吉石庵丛书》。1925 年，商务印书馆根据小字本排印了该书。^③

1926 年 3 月，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教授在日本的内阁文库发现了《全相平话五种》。1928 年张元济访问日本时，向日本内阁文库借印此书，1929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了《全相平话五种》。

1929 年，海宁慎初堂陈氏将《三国志平话》收入《古佚小说丛刊》初集印行。

1928 年春，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来华，向著名藏书家马廉出示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《清平山堂话本》的照片。这些作品包括《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》《简帖和尚》《西湖三塔记》《合同文字记》《风月瑞仙亭》《蓝桥记》等十五篇小说，马廉随即与友人发起“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”，托北平京华印书局于 1929 年将十五篇作品影印出版，仍旧题为《清平山堂话本》。

1933 年，马廉在故乡宁波买到了一批书，他从中又发现了十二

① 转引自丁锡根点校：《宋元平话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，第 892 页。

② 关于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的真伪问题，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，成为 20 世纪宋元话本研究的一大学术公案。

③ 参见罗书华、苗怀明等：《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，第 39 页。

篇小说,其中《雨窗集上》一册,内含话本五篇,包括《花灯轿莲女成佛记》《曹伯明错勘赃记》《错认尸》《董永遇仙传》《戒指儿记》;《欹枕集上》残篇七页,内含话本两篇,为《羊角哀死战荆轲》《死生交范张鸡黍》;《欹枕集下》一册,内含话本五篇,为《老冯唐直谏汉文帝》《汉李广世号飞将军》《夔关姚卞吊诸葛》《雪川萧琛贬霸王》《李元救朱蛇记》。马廉研究后认为该书是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。^①后来,阿英先生又发现了《翡翠轩》《梅杏争春》两篇的残页。

1934年,马廉将《雨窗集》和《欹枕集》的残本影印出版。

至此,宋元话本的基本资料已经具备,此后很少有新的重大研究资料发现。^②当然,如果要追溯宋元话本的源头,还应该算上在敦煌发现的“变文”。

1900年,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一大批文献资料,其中的“变文”已经成为研究宋元话本来源的重要资料,特别是其中的《庐山远公话》《韩擒虎话本》《叶静能诗(话)》《唐太宗入冥记》《秋胡变文》等作品已经被当代学者认为是较为标准的唐代话本。^③

这一时期学术界对宋元话本的研究,主要侧重于一些最为基础的问题,如什么是话本?宋代的说话有哪四家?哪些作品是宋代话本?

国内学者中最早对宋元话本进行研究的当属王国维^④。王国维在其专著《宋元戏曲史》(该书完成于1912年年底至1913年年初)的第三章“宋之小说杂戏”就对宋元话本进行了初步的研究。他认为“宋之小说,则不以著述为事,而以讲演为事”。这里的“宋之小说”,其实指的就是宋元话本,而不是宋代的文言小说。对于宋代“说话”的四家,他注意到了《都城纪胜》与《武林旧事》记载的差异;他还认为“今

① 参见马廉著,刘倩编:《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》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82~87页。

② 1979年,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清理所藏古籍时,发现了一张元代刊刻的《新编红白蜘蛛小说》残页,为宋元话本研究的重要资料。

③ 参见萧欣桥、刘福元:《话本小说史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,第76~87页。

④ 国外学者中较早研究宋元话本的当属日本的盐谷温,他在《中国文学概论讲话》中已有所涉及。

日所传之《五代平话》，实演史之遗；《宣和遗事》，殆小说之遗也”^①。《五代史平话》于1911年出版，王国维就将其运用到了论著之中，可见其对新材料的敏感性。王国维关于宋元话本的论述虽然十分简略，但是在学术史上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。

该时期对宋元话本研究最为全面、深入的当属鲁迅。在他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1924年版)中，第十二篇“宋之话本”、第十三篇“宋元之拟话本”两章都是论述宋元话本的。第十四篇“元明传来之讲史(上)”，他又论述了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在《三国演义》成书过程中的作用。鲁迅对于宋元话本的研究，其贡献主要在以下方面：

1. 首次明确了“话本”的定义，“说话之事，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，随时生发，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，是为‘话本’”。这一定义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和采纳。后来，虽然有日本学者增田涉提出过质疑，但是仍然无法撼动这一观点的统治地位。时至今日，大多数学者仍然采纳这一观点，仍然认为宋元的“说话”是有底本的。

2. 首次将宋元话本的源头向上追溯到了唐代，并且引述了敦煌“变文”中《唐太宗入冥记》的部分内容。受其影响，以后的小说史也大多采用了这一方法，只是对敦煌“变文”中的相关篇目的论述更加详细、深入了。如欧阳代发《话本小说史》(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)，张兵《宋元话本》(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)，萧欣桥、刘福元《话本小说史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)等都是如此。

3. 论述了宋代“说话”的四家。鲁迅列举了《梦粱录》《都城纪胜》《武林旧事》对于“说话”四家的不同记载，对于应该采纳哪一种说法，鲁迅并没有明确表态，只是对于《梦粱录》中的材料引述得较为详细。1924年7月，鲁迅在西安讲授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时，则认为“‘说话’分四科：一、讲史；二、说经诤经；三、小说；四、合生”。这种分类法大体上采用了《梦粱录》中的说法。而“说话”四家到底是哪四家，成为以后较长时期内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。

4. 鲁迅对宋元话本的重要作品进行了介绍和评价。鲁迅论及的

^①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《五代史平话》《宣和遗事》都属于讲史一家，《宣和遗事》并不属于小说一家。

宋元话本作品主要有《梁公九谏》《新编五代史平话》《京本通俗小说》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。从整体上来看,鲁迅对宋元讲史家的话本论述较多,《新编五代史平话》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都属于讲史话本;他对宋元小说家的话本论述较少,只提到了《京本通俗小说》中的《碾玉观音》篇。

另外,鲁迅对宋元话本的体制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,如关于“得胜头回”,他认为“头回犹云前回,听说话者多军民,故冠以吉语曰得胜,非因进讲宫中,因有此名也”。

鲁迅之后,对宋元话本论述较多的是胡适。

1928年,胡适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标点的《宋人话本八种》所写的《序》中对宋元话本作较为全面的论述。亚东图书馆出版的《宋元话本八种》实际上即缪荃孙刊刻的《京本通俗小说》中的七种小说话本,再加上后来叶德辉刊刻的《金虏海陵王荒淫》一种,共八种。胡适认为“我们可以不必怀疑这些小说的年代。这些小说的内部证据可以使推定它们产生的年代约在南宋末年,当十三世纪中期,或中期以后。其中也许有稍早的,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(一一八九)之前,最晚的也许远在蒙古灭金(一二三四)以后”。1934年,胡适在《宋人话本重订本小序》中采纳了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《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》一文中的观点,删去了《金虏海陵王荒淫》一篇,认为这篇是叶德辉伪造的,以《宋人话本七种》由上海亚东图书馆重新出版。
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对宋元小说家的话本论述较少,而胡适对宋元小说家的话本论述较多,特别是对《拗相公》《碾玉观音》《错斩崔宁》等篇论述较为详细。他认为《错斩崔宁》是其中的佳作,“这一篇是纯粹说故事的小说,并且说的很细腻,很有趣味,使人一气读下去,不肯放手;其中也没有一点神鬼迷信的不自然的穿插,全靠故事的本身一气贯注到底”,特别是其中写刘贵与其妾陈二姐对话的部分,“这样细腻的描写,漂亮的对话,便是白话散文文学正式成立的纪元”。当然,胡适的论述是建立在《错斩崔宁》是真正的宋人话本基础上的。如果《错斩崔宁》不是宋人话本,那么这个所谓的“白话散文正式成立的纪元”就要往后推迟了。

胡适对于鲁迅的相关论述基本上持肯定态度，但是他不同意鲁迅对“得胜头回”的解释，胡适认为，“《得胜令》乃是曲调之名。本来说书人开讲之前，听众未齐到，必须打鼓开场，《得胜令》当是常用的鼓调，《得胜令》又名《得胜回头》，转为《得胜头回》。后来说书人开讲时，往往因听众未齐，须慢慢地说到正文，故或用诗词，或用故事，也权做个‘得胜头回’”。笔者认为，胡适对“得胜头回”的解释更为合理一些。

另外，胡适也谈到了宋代的“说话”四家，他认为四家分别是：小说、讲史、傀儡和影戏。这四家与王国维、鲁迅的观点都不同，胡适《〈宋人话本八种〉序》声称他以后会有专门的文章来论述这一问题。不过，胡适后来再也没有就此问题发表意见。胡适以后的学者，也没有人采纳胡适的四家之说。

20 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宋元话本的研究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，论述也更加深入。这一时期的主要学者有孙楷第、谭正璧、陈汝衡、赵景深等。

孙楷第是这一时期对宋元话本研究较多的学者。他先后发表了《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》（《学文杂志》1930 年创刊号）、《说话考》（《师大月刊》1933 年第 10 期）、《词话考》（《师大月刊》1933 年第 10 期）等文章，对于宋元说话的家数、来源等进行了研究。他认为宋代的“说话”四家分别是：

1. 小说：银字儿，包括烟粉、灵怪、传奇、说公案、说铁骑儿；
2. 说经：说参请、说诨经、弹唱因缘；
3. 讲史书；
4. 合生、商谜。

这四家与鲁迅的看法不同，与胡适、王国维的观点也不一样。他的四家比鲁迅的四家所包括的范围更为广泛，他把商谜和弹唱因缘也都算作四家之内。他在《词话考》中认为元之“词话”即宋代的“说话”。另外，他还著有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《日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》等。胡适 1932 年为他所著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作的《序》中称赞他是“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。他的成绩之大，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。他的方法，无他巧妙，只是用

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”，认为他建立了“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”。^①

谭正璧的《中国小说发达史》1935年由上海光复书局出版。该书共七章，其中第五章为“宋元话本”，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宋元的话本、说经话本和讲史话本，对每篇话本内容的介绍也较为详细。这种安排内容的方式，为后来的多种话本小说史所采纳。另外，谭正璧也谈到宋代的“说话”四家，他认为“四家”是指小说、说铁骑儿、说经、说参请。^②而对于“话本”一词的定义，他认为：“‘话本’这个名字，为当时一切伎艺人员所用文字底本的共名，不是‘说话’一技所独有的。”这与鲁迅的观点有了区别。

陈汝衡的《说书小史》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，其中第四章“南宋说书”中“论南宋说话四家”颇受学术界重视。陈汝衡认为南宋“说话四家”如下表：

说话四家	内 容
1. 银字儿	烟粉、灵怪、传奇
2. 说公案、说铁骑儿	朴刀杆棒、发迹变泰之事、士马金鼓之事
3. 说经、说参请、说浑经	演说佛书、参禅悟道等
4. 讲史书	讲说前代书史文传、兴废战争之事

附注：1、2 两项总称小说。

另外，陈汝衡指出，“今存的所谓宋元话本小说，绝大部分都是经过元明人士增订和加工的，因此我们很难断定它们成书的确实年代”。这种观点其实触及了宋元话本研究的困境——研究对象的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，这种困境愈到后来愈为明显。

赵景深是20世纪40年代在宋元话本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一位学者，他重点研究了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印的《全相平话五种》与后世小说的关系，如《武王伐纣平话》与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七国春秋后集》

① 胡适：《胡适文存》（第四册），黄山书社1996年版，第292页。

② 谭正璧：《中国小说发达史》，光明书局1935年版，第237页。

与《前七国志》、《前汉书平话续集》与《西汉演义》之间的关系。他认为“《封神演义》从开头直到第三十回，除哪吒出世的第十二、三、四回外，几乎完全根据《平话》来扩大改编。从第三十一回起，便放开手写去，完全弃掉《平话》，专写神怪的部分了……作者直写到第八十七回孟津会师，方才想到《平话》上还有材料不曾用进去，这才再用《平话》里的材料”。赵景深对《武王伐纣平话》的研究是非常细致、深入的，他得出的结论也比较可靠，至今仍常被学者征引。

另外，他的《南宋说话人四家》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，他针对王国维、胡适、鲁迅、谭正璧、孙楷第、陈汝衡、青木正儿、胡怀琛等人关于“说话四家”的不同观点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认为“应以小说、说经（附说参请）、讲史以及说诨话为四家”。^①

综上所述，这一时期宋元话本新材料的发现，有赖于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。而在研究的过程中，学者们都非常重视新材料的运用。这一时期学者们研究的最热点问题是宋代说话“四家”到底是哪四家，凡是涉及这一领域的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，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又几乎人言人殊。对于宋元话本的思想内容、艺术特色、题材来源、对后世的影响等诸多方面的研究，这一时期的学者还讨论得比较少。

二、宋元话本研究的发展期（1949—1978）

1949年以后，新中国的经济、文化建设都处于百废待兴时期，这一时期的宋元话本研究特点是：学术基础知识的普及和学术研究的逐渐深入。这一时期又以1966年开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为界分为前后两段。

宋元话本学术基础知识的普及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 研究宋元话本的基本的学术资料被重新排印出版，公开发行。如古典文学出版社在1954—1958年先后排印出版了《新编五代史平话》《宣和遗事》《全相平话五种》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《京本通俗小

^① 赵景深：《中国小说丛考》，齐鲁书社1980年版，第79、99页。

说》《熊龙峰刊四种小说》，等等，文学古籍刊行社、作家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也都出版了部分宋元话本的影印本和排印本。某些原来只有少数学者才能见到的学术资料，现在大部分学者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了。学术资料的普及，无疑为广大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。

2. 话本小说选集的出版。这一时期出现了好多种宋元话本小说的选集，如傅惜华选注《宋元话本集》(上海四联书店 1955 年版)，共选话本十八篇，包括《碾玉观音》《错斩崔宁》《西山一窟鬼》《志诚张主管》《西湖三塔记》，等等，他在《导言》中对这些话本的本事来源、作品时期、著录书目、流传版本做了详细的说明。不过，从今天的观点来看，他所选的许多篇目并不属于宋元话本，如《沈鸟儿画眉记》《梅岭失妻记》等。东北人民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编《宋元话本选》(东北人民大学教务处教材出版科 1955 年版)，该书选择所谓的宋元话本六篇，包括《碾玉观音》、《冯玉梅团圆》、《错斩崔宁》、《众名姬春风吊柳七》、《大宋宣和遗事(节选)》、《新编五代汉史平话》。胡士莹选注《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》(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 年版)选录了《碾玉观音》(《京本通俗小说》卷十)、《错斩崔宁》(《京本通俗小说》卷十五)等宋元小说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的《话本选注》共选话本八篇，分为上下两册(中华书局 1960 年 3 月第一版，1962 年 10 月第四次印刷，印数达 87 000 册，发行量很大)。其中吴晓玲、周妙中、范宁选注《话本选》，共选话本三十八篇，范宁写了长达三十多页的《序言》。在《序言》中，范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和研究方法，从话本作品所反映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等标准出发，详细地论述了话本小说在题材、内容、人物形象、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特点，并指出了其因果报应等方面的历史局限性，是一篇全面地论述话本小说的专题论文。

宋元话本研究专著的出现，则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深入。

程毅中的专著《宋元话本》1964 年作为“知识丛书”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。该书共分为四章：第一章“说话和话本”分别论述了说话的渊源、宋元说话概况和话本编写、流传情况。第二章“讲史”，论述了讲史的名目、体制、题材、主题思想等。第三章“小说”，论述了

小说的题材、篇目、体制、思想性和艺术性。第四章则论述了宋元话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、作用和影响等。虽然这本书不到十万字，但它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宋元话本的专著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。

孙楷第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表的《说话考》《词话考》《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》等五篇文章结集为《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》，1953 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；1956 年该书又由作家出版社易名为《俗讲、说话与白话小说》再版；他的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》也于 1953 年由上杂出版社再版。

许政扬关于宋元话本的研究，也值得一提。他主要从话本中的典章制度出发，来判断作品的成书年代。例如，在《话本征时》一文中^①，他根据《简帖和尚》中“如今叫做‘连手’，又叫做‘巡军’”一句话，认为“从巡军设置于元而‘所由’之称南宋时仍流行这一事实看来，话本《简帖和尚》不可能是宋代作品，它必定产生于元代以后”；他根据《戒指儿记》中商人阮三“点报朝中驸马，因使用不到，退回家”一语，认为点报驸马是明代的制度，该篇应产生于明代。许政扬的《话本征时》一文为判断话本的成书时代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。这种学术方法也为后代学者广泛吸收和采纳，在研究史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。另外，他还著有《宋元小说戏曲语释》78 条，不过，许政扬的文集直到 1984 年才得以出版，其学术影响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。

胡士莹的《话本小说概论》也草创于这一时期，根据赵景深为该书所写的《序》，可知该书 1962 年已经完成初稿，1965 年又完成了第二稿，但是，该书正式出版却到了 1980 年。

另外，关于宋代“说话四家”问题，这时又有了新的说法。李啸仓的《谈宋人说话的四家》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篇总结性的文章^②，该文先列举了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、西湖老人《繁胜录》、灌园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、吴自牧《梦粱录》、周密《武林旧事记》等关于说话艺术的相关记载，又列举了鲁迅、王国维、胡适、孙楷第、谭正璧、陈汝衡等关于说话四家的八种说法及其理由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

① 许政扬：《许政扬文存》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，第 258 页。

② 参见李啸仓：《宋元伎艺杂考》，上杂出版社 1953 年版。

观点,他认为说话四家是指:

1. 银字儿(烟粉、灵怪、传奇);
 2. 说公案(朴刀杆棒、发迹变泰之事)、说铁骑儿(士马金鼓之事);
 3. 说经(演说佛书)、说参请(参禅悟道等事)、说诨经;
 4. 讲史书(讲说前代书史文传、兴废争战之事)。
- 并附注说,前面两项合称“小说”。

其实,他把“小说”一家拆分成了两家,这样“说话”四家就合并成了三家。这种新的观点仍然没有取得学术界的公认,说话“四家”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。但是,这种建立在全面理解基础上的学术对话,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和更大的可能性。

1966—1976年,中国大陆进入了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各种正常的学术活动基本上停止了,该时期几乎没有出版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。

而在我国的台湾地区,学者们对于宋元话本的研究仍然在继续,陆续出现了一些专著和硕士、博士学位论文。如庄因《话本楔子汇说》(台北台大文学院1965年)、乐衡军《宋代话本研究》(台北台大文学院1969年)、何志平《宋话本的研究》(台中东海大学中研所1973年硕士学位论文)、潘寿康《话本与小说》(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版)、李本耀《宋元明平话研究》(台北师大国文研究所1973年硕士学位论文)、杜奕英《短篇白话小说的文学论》(台中东海大学中研所1978年硕士学位论文)、李宜涯《元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五种研究》(台北文化学院中研所1978年硕士学位论文)。另外,日本学者原田季清《话本小说论》,1975年由台北祥志出版社出版。^①其中,乐衡军一直从事宋元话本研究,成果颇多。只是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,由于受当时政治和社会环境的限制,大陆的学者对他们知之甚少,此时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也缺乏正常的学术交流和讨论。

日本学者增田涉1965年在日本的《人文研究》(十六卷,五号)上

① 此部分内容参考了朱传誉主编的《研究宋元小说专著序目》《宋话本研究资料——说话与说话人》两书,中国台北天一出版社1982年版。

发表了论文《论“话本”一词的定义》，该文在宋元话本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增田涉针对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话本是“说话人的底本”这一说法，他从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和“三言二拍”中找出了二十多则例证，认为“话本显然是故事的意思，说什么也没有‘说话人的底本’的意思”。这一观点对鲁迅的观点提出了强烈的质疑，获得了不少学者的支持。我国台湾学者王秋桂在该文的《校后记》中，认为“话本也用来指供阅读的传奇文”，他同时指出说话人即使有底本，“它们所提供的也只是素材，善说者可任意据以铺陈，演说实际的情形和‘底本’可以有很大的区别”^①。我国大陆的学者对这一观点的态度可分为两派：一派持反对意见，如刘兴汉《对“话本”理论的再审视——兼评增田涉〈论“话本”的定义〉》（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96年第4期）、萧欣桥《关于“话本”定义的思考——评增田涉〈论“话本”的定义〉》（《明清小说研究》1990年第3、4期）；一派持肯定意见，如周兆新《“话本”释义》（《国学研究》第二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）、胡莲玉《再辨“话本”非“说话人底本”》（《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2003年第9期）等。

笔者认为，关于话本定义的分歧，其根本点在于对“话”一词的解释，从唐代以来“话”就带有“故事”的意思，如果“话本”也解释为故事，那么，“本”字就没有了着落。“话本”有时则可指用来阅读的故事本子，而不是指抽象的故事；不管这些“话本”是不是“说话人的底本”，但是“话本”有时是可以用来阅读的，有时则可以用来讲述。

三、宋元话本研究的全面繁荣期(1979—2013)

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大陆的学术界又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学术活动。在宋元话本研究界，学者们也可以自由地、公开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了。宋元话本的研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^① 参见中国台湾静宜文理学院编：《中国古典小说专集》（三），中国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，第49~68页。

1. 出现了一系列的话本小说研究的专著

本时期宋元话本方面的研究专著,主要有胡士莹《话本小说概论》(中华书局1980年版),程毅中《宋元话本》(中华书局1980年版),张兵《话本小说史话》(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),欧阳代发《话本小说史》(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),萧相恺《宋元小说史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),石麟《话本小说通论》(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),程毅中《宋元小说研究》(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),萧欣桥、刘福元《话本小说史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),等等。

其中,胡士莹的《话本小说概论》是该时期最早的一部全面论述话本小说的专著。该书共十八章,分别论述了话本小说的发生、发展、繁荣、衰落的全过程,其中第二章到第十章都是论述宋元话本的,其内容大约占全书的一半。程毅中的《宋元话本》在1964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,又重新出版。张兵的《话本小说史话》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话本小说的发展历程,特别是重点介绍了宋元话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,该书虽名为《话本小说史话》,其实命名为《宋元话本史话》更加合适,该书对宋元以后的话本小说作品基本上没有涉及。欧阳代发的《话本小说史》也是较早的一部全面论述话本小说的专著,但是该书对于宋元话本的介绍较为简略,对“三言二拍”以及明清的拟话本小说集的介绍较以前都要详细一些。萧相恺的《宋元小说史》与程毅中的《宋元小说研究》出版年代接近,编辑体例相似(两书都把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分开来论述,只不过前者将话本小说称为“市人小说”)。两书中关于宋元话本的部分,前者对于“小说”家的话本论述较多,后者对于“讲史”家的话本论述较多。萧欣桥、刘福元的《话本小说史》则是一部后出转精的话本小说史著作,该书共十六章,对宋元话本的论述有四章。该书没有对宋元说书的情况进行全面的论述,而是重点论述了宋元话本的主要作品及其特点。另外,对唐代话本小说的论述,该书也较其他同类书籍详尽。石麟的《话本小说通论》则主要采用以类相从的方式,将话本小说按题材内容的不同分为风情类、市井类等十类,并论述了各类话本小说的特点。这一系列的研究著作,从不同的侧面、不同的角度对话本小说进行了阐释和解读,使话本小说的研究一步步走向深入。

2. 话本小说集和话本小说选の整理出版

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大陆曾经出版过一系列的话本小说集，但是经过“文革”十年的扫荡，许多书籍已经不容易见到。20 世纪 80 年代初，学术界又出版了一系列的宋元话本作品集。如上海古籍出版社选《话本选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），萧欣桥选注《宋元明话本小说选》（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出版了《京本通俗小说》，欧阳健、萧相恺编订《宋元小说话本集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），欧阳健、萧相恺编订《宋元说经话本集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），丁锡根点校《宋元平话集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），吴伟斌、张兵编著《宋元话本赏析》（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），卢兴基编著《市井悲喜剧——中国古代话本卷》（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），刘世德主编《中国话本大系列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—1994 年版），程毅中辑注《宋元小说家话本集》（齐鲁书社 2000 年版）。

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作品集不同，这些作品集大多经过了编者的认真整理和研究，其学术水平大为提高。如欧阳健、萧相恺编订的《宋元小说话本集》，按照罗烨《醉翁谈录》中“小说家”的分类和次序，将宋元的小说话本分为灵怪、烟粉、传奇、公案……八类，共收录宋元小说家话本六十七篇，其中灵怪类十四篇，烟粉类六篇，传奇类十七篇，公案类十二篇，朴刀类一篇，杆棒类两篇，神仙类六篇，妖术类一篇，其他类八篇。在每篇作品的后面，编者都对其断代的依据做了说明，为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版本依据。

丁锡根点校的《宋元平话集》，共收录宋元平话八部，每种平话前都有一段详细的“说明”，分别介绍平话的卷帙、内容、版本等情况，最后的附录部分辑录了相关的序跋和平话的基本资料。

程毅中辑注《宋元小说家话本集》，共收宋元小说家话本四十篇，存目叙录二十二篇；其辑注主要包括解题、话本原文和词语注释三部分。其中，解题部分考述每篇的著作年代、本事源流及影响，词语注释部分主要以话本注释话本，在第一次出现时作汇释。在该书的《前言》中，他重点论述了小说家话本的断代问题。

刘世德主编《中国话本大系列》原计划收录话本小说约一百种，